

# 虎与龙

在发展进程中，印度与中国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

穆尔塔扎·赛义德、邬杰明

中国和印度是新兴世界中的两大巨人。两国拥有超过全球 1/3 的人口，即使发展速度不快，它们也会对全球经济走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和印度跃居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列。1995 年来，中国平均收入增加了近 10 倍，而印度的平均收入增加了近 4 倍。尽管政治和经济体系大不相同，两国已使成千上万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均和环境恶化的现象亦在不断加深。考虑到这些变化的规模，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有着深刻的含义。

然而，中国和印度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模式着重于推动对外出口的制造业。印度也在不断地与全球经济融合，在其经济模式下，内需和服务业一直处在相对重要的地位。这一进程演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

中国技术人员在印度普那与印度工人讨论混凝土机械。





印度的经济增长略逊于中国，但是从石油化工到软件的很多领域，印度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包括T恤、空调、iPod配件和家具在内的中国产品几乎已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销售。相比之下，印度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了很多服务，包括其工程师进行了办公流程自动化、其呼叫中心解决软件的故障，其制药公司生产了通用的药物。

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和印度的情况类似——低收入、大量农村人口、几十年来自我施加的经济放逐，以及高度的中央控制——那么两国是如何绘制出其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呢？考虑到这些差异，两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该如何相互借鉴？

## 改革是如何开始的？

中国的改革不是始于修建工厂和吸引游客的摩天大楼，而是通过改变乡村面貌开始的。1978年，依靠集体农场辛苦度日的农民占其总人口的80%。当时，公有土地租借给了个体农户，这些农户被准许自行选择农作物品种并可以在自由市场中出售任何超出国家配额部分的农产品。这些农业改革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并允许大部分经济活动和劳动力摆脱中央计划进而进入工业领域——同时引发了导致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系列变化。随后，在1980年，中国开始通过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来重新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依靠税收自主以及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这些经济特区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投资，而这种改革试验也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地区。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减轻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令其转向新技术领域投资并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扶持下，通过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出口领域的公司学会了高效率的工作方式。通过借鉴日本和韩国信奉的东亚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中国成功地将其过剩的劳动力和全球生产体系联系在一起。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进一步刺激，其总贸易（出口加进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GDP中低于10%的比例迅速提高到目前的近50%，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寥寥无几发展到过去5年期间，每年15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始于1991年的印度经济改革起步稍晚于中国。由于无需着重于产权和缺少政府监管，这些改革起初侧重于收支危机后改善经济的灵活性。首轮改革中取消了对制造和贸易的限制。1991年前，许可要求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全境，工业领域的外国竞争寥寥无几或根本不存在，政府对从运输业到金融业的干预限制了创业和增长。20世纪90年代，很多领域都取消了许可

要求，关税下降，印度的金融市场也对外开放。金融业的流入占GDP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零投入上升到在2007年，即全球经济危机前一年，接近于8%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其中服务业的发展突出。这主要源于其大量训练

## 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可能要终结。

有素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工程师能够将西方的商业模式转化到一个低成本的环境中。服务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由1994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7.75%。始于客户服务和软件编程的简单外包扩大到新商务流程和软件的开发，对基本法律和医疗案件的处理和其他服务。印度也在医药领域等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劈出一片新天地。尽管印度的出口增长尚无法与中国的抗衡，但直到2011年，其出口商品和服务约占其GDP的24.5%，只是略微低于中国的28.5%。

## 当今印度和中国的地位如何？

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以及其更为迅猛的增长使得其收入水平高于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生产的玩具、鞋类、汽车部件和计算机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且其制造业雇用的人数超过1亿。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少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其劳动力市场萎缩，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可能要终结。

过去10年，改革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不均衡。投资由原来占GDP近13%的比例，激增到现在约占其产出的一半；与之对应的是，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已从45%下滑到了35%。如果这种不均衡性持续下去，过度投资可能由于过剩产能加剧、生产力降低和银行坏账增加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恶化。严重的污染和能源需求也对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

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指出，必须为投资和消费寻求更好的内部均衡性以确保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应通过提高资本价格对低成本投资予以补偿，根据国际标准进一步提高其他主要投入的价格（如土地、能源和水）并更好地保护环境（见本期《金融与发展》，“聚焦变化”）。中国可以采取两种并进的方式来刺激消费需求——即增加家庭收入和减少家庭

和企业存款：通过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领域增加高附加值领域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通过更为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公平地对家庭进行补偿，更有效地分配资本的金融改革减少家庭和企业的存款。令人鼓舞的是，大部分改革已经在中国政府的视野中，但是否能够及时实施上述改革将至关重要。

在印度，其特征鲜明的服务业为国家带来一些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高附加值领域中涌现出众多世界级的私人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和塔塔咨询（TCS）等公司在世界高端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中角逐。但是据估计，印度信息技术行业的就业仅有 250 万人，或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 0.5%。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仅为 1500 美元/年。

未来几十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迅猛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将涌入劳动力市场。为这些人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无疑将需要进行许多改革。教育和医疗需要改善，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管理需要进行大幅调整。从吞吐量不足的港口、过于拥堵的道路交通到混乱的采矿权和停电——这些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必须得到解决。当然，通过简化规章制度、消除官僚作风和减少对外贸易壁垒对经济环境进行改善也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对金融系统进行改善，以便使更多人能够存款和借贷，并且使公司更易于进行长期投资。

没有持续稳定的改革，就不可能有效地创造就业机会。而这又需要政府和印度联邦储备银行对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进行监管，通货膨胀在近年来已经上涨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预算赤字也一直居高不下，并且可能阻碍投资和抑制资本市场的发展。

## 面对共同的挑战

印度和中国也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尤其是包容性的增长，在两个国家均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在减少贫困方面的贡献史无前例。在印度，在 1993 年到 2009 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从 36% 下降到了 22%；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 4 亿多人口已摆脱了贫困。尽管这些数字令人震撼，但是很多人的生活仍不尽如人意。印度尚存在 2.5 亿贫困人口，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相当低；在中国，近几年来，农村的生产力停滞不前，公共服务也需调整，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对更高品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需要。

除此之外，两国也迅速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受教

育人群的工资，特别是城市中受教育人群的工资增长远远高于那些贫困的，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工资增长。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逐渐与发达国家民众的水平相接近，然而城市中产阶级人口与大量生活在农村以及未充分受益于经济迅速发展地区的贫困人口之间的生活差异在两国都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系紧张。

## 相互借鉴

为了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地增长，中国和印度需要调整其经济结构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内外需求以及它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了实现上述的平衡——两个至今采取了不同发展战略的国家——相互借鉴将有助于它们做得更好。

首先，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印度可从邻国更长时间的改革纪录中学习到底些什么？农业和农村改革在经济发展初期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不但将劳动力解放到了工业领域，也激发了对各类工业产品的需求。尽管印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经历了它自身的“绿色革命”，但价格和公共投资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从正在进行的改革中获利，印度需要像中国在它的腾飞初期一样，为农业和工业创造更大的协同效应。毕竟，在印度有半数的工人和 1/6 的产量依赖于农业。

中国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于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国的投资，这些也顺带刺激了其就业机会的创造。通过允许进口和直接的外商投资进入其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核心的贸易伙伴，虽说固然常常带有某些附加的限制，但却为本国公司创造了针对激烈的外部竞争进行调整的条件。

有助于改革成功的政策包括建立灵活的经济特区和优厚的外商投资体制、支持出口的商业环境和监管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两国改革中均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印度可以向中国学习借鉴，如何开放其国内市场去面对竞争，政府政策如何协助发展制造业和促进就业。

除此之外，作为印度发展改革绊脚石的因素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驱动力：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者，甚至在城镇建造初期就已着手对道路进行建设。中国对出口的重视促使其大力投资货运运输，以及如今的铁路客运、港口设施、机场、甚至是高速公路。中国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已迅速发展，如，上海和北京的地铁已跻身于世界最大规模的地铁之列。中国在能源方面的投资——传统领域的煤炭以及当今的各种可再生能源——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然而，在印度，基础建设却成为一颗绊脚石。政府的直接所有权使得铁路方面的投资变得复杂化。某些机场私有化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港口设施投资却较为滞后，能源生产和运输受落后的定价模式和法规制约而极大地增加了投资成本。这为印度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来协助发展，改善连通性和降低出口成本提供了充分的改善空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可能不会完全或轻易地在其他国家被复制，但是，这毫无疑问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发展目标的捆绑模式展现了生动的一课。



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

此外，中国可向印度学习借鉴些什么呢？印度相对先进的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关键的领域。尽管印度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却拥有高度成熟和透明的股票市场。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开放度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有效地开放存取来自外来者的投资资本。这不仅成为了印度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也将透明度和开放性引入了印度的企业文化中，否则印度公司有可能无法动用外来资金。公司在印度股票市场的上市需要与发达国家相似的透明度。这也改善了大型公司的市场纪律和信用。

两国的金融系统仍以国家为主导，外来投资者的机会仍然有限，相比之下，印度的金融系统更面向市场。银行存款利率的完全开放提高了存款人的回报率。公共银行和私人银行为大公司的生意而竞争，鼓励更为有效及合理的资源配置。相比之下，中国股票市场对外来投资者相对更封闭和不透明。改善对股票市场的疏忽和向外商开放，将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信息的获取以及改善市场纪律及资金配置。而那些无法直接与外资公司建立直接合资的企业也可以更容易地筹集资金。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将产生类似的有利影响，并可以增加家庭财政收入。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正处于重新平衡期，因此也可向印度借鉴发展服务业的技巧。印度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系统尽管尚未完善，但是在较少的政府干预和扭曲下可为公司进行资金配置。同样，由于对其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中国可借鉴印度的“无形人才建设”。通过对职业教育以及出口为导向的科技

园的扶持，印度政府已在某些领域得以发展和保存其优势，而中国也需要这些领域的发展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上述的领域中，印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正确的政策下，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其人口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印度和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加强。自经济开放以来，两国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从拥有大量贫困人口且与外界缺乏联系的状况发展到当今成为了购买力平价中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其不同的经济模

式说明，国家的发展没有单一的模式，中期来看，保持增长将面临各种挑战。

两国仍有很多人生活较为贫困，几乎无法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经济改善所带来的成果。在印度，改善基础建设和开放制造业经济来引入竞争将有助于加快增长，促进经济更全面地发展。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略有经验。在中国，将经济从建设和出口为主导向服务和消费领域转型并使金融体系更面向市场，这将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和扩大其收益。而印度在这些领域已拥有了成功经验。

尽管中国和印度在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是在规划下一阶段的重大发展的过程中，仍有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学习。■

穆尔塔扎·赛义德 (Murtaza Syed) IMF常驻中国副代表，邬杰明 (James P. Walsh) 为IMF亚洲及太平洋部高级经济学家。